

ZHONG GUO LIDAI WAIJIAO JIA

# 中国历代 外交家

何茂春 ● 师晓霞 ● 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 ●

doc5ive 文川网  
古语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语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中国历代外交家

何茂春 师晓霞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责任编辑: 张新安 王长江**  
**封面设计: 白长江**

**中国历代外交家**

**何茂春 师晓霞**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欣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25 印张 268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8000**

**ISBN 7-5017-1232-8/K·14**

**定价: 8.00 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本书献给历史上为沟通中外联系，为维护国家权益而献身外交事业的人们；献给关心此书及作者的友人。

何茂春 师晓霞

## 前 言

《中国历代外交家》是我们在写《中国外交通史》上卷期间收集资料，在《通史》写完以后整理而成的。其中介绍了数十位中国历史上能言巧辩、不辱君命、不辞劳苦的使臣或在某一阶段外交斗争中发挥了一些重要作用的人士或对外交策略、邦交理论与实践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上至纵横家始祖周朝吕尚，下止中华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

史学界近年来有不少专门史的通史著作问世，如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制度史、经济史、货币史、间谍史、宦官太监史、娼妓史、建筑史、宗教史、科技史等等，相应也有专门史的历史人物传记。我们用了十二年所写的第一本外交通史也可望于近期内向读者交卷，篇幅所限，我们在通史的历代外交官列传中只能简要介绍一些他们的主要业绩，而这本书我们列出了更多的人物并用尽可能多的史料更生动地反映他们的人生——甘苦、荣辱、悲欢、生死。我们不仅写“正面人物”，即被道德家们叫好的人物，也写有争议的人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主管外事或出使异国异邦的人物有数万之众，很难说本书中的人物具有典型意义或代表性，困难在于作者的学识和资料都是有限的。

说起外交家，先当谈谈“外交”的概念。

“外交”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甚至

是滥用,如“企业外交(企业公关)”、“家庭外交(邻里关系)”等。

狭义上的“外交”是指主权国家为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并对他国对外政策或国家集团的联合对外政策作出反应的和平的对外活动,包括制定外交政策和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政治活动,如政府间不同级别的互访、谈判、结盟、缔约、调解、斡旋、召开或出席国际会议及一般的使节领事活动等。

此处不妨引用国内外其他一些权威定义:

已故的前苏联外交家兼外交理论家葛罗米柯主编的《外交辞典》是这样说的:“为完成国家的对外政策任务而由政府机关(外交主管机关,往往是政府首脑的国家元首)及其在国外的代表执行的一种事务性的、和平的、不同于军事的业务工作。”另一苏联学者B·波将金主编的《外交史》上有这样一段话:“外交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性质取决于不同经济形态所固有的不同社会关系,而首先取决于它为之服务的那个国家的阶级性质。”

西方广泛引用的权威性解释是牛津英文词典中的定义:“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英国外交官萨道义(Satow)在他所著的《外交实践指南》中开篇定义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

我国《辞海》中的解释是:“外交——国家为实行其对

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本书认为，各种定义都有共同点，不同之处可以互相补充。欧美各国“外交”一词均源自古希腊语“*διπλωμα*”，罗马语拼为“*diploma*”，本意为“折叠”。古罗马帝国的道路上所用的一切护照、通行证和旅客单都刻在两张金属片上，用一定方式折缝在一起。这些金属通行证被称为“*diplomas*”（文凭）。后来这个词就延用到官方文件，特别是外交文件上。以致于到了17世纪，这个词就有整理、训古、编类、档案、文凭等含义。今天英文毕业文凭称“*graduation diploma*”就是引申义之一。18世纪后期，英语中的“*diplomacy*”就有了“外交”的含义。现代欧洲语言“外交”一词只有拼写上细微的区别，如：*diplomatie*（德语、法语），*diplomacia*（西语），*diplomzia*（意语），*Дипломатия*（俄语）……。总的来看，欧美语言 *diplomacy* 一词是由“凭证，信物”引申出“外交”含义的。

有趣的是，中国的“使节”一词开始也是由“旌节”（一种带纓长杖）引申而来的，这里的“节”就是用金、银、铜镶嵌的符信之物。古代中国“使”和“节”是不可分的，苏武被扣匈奴而天天捧着汉武帝给他的旌节（外交信物），汉语因而产生了一批新词汇：不失节、节气、节操、高风亮节、晚节等。中国人把使节忠于皇帝看待象妇人忠于丈夫一样重要，因此形成了“贞节”一词，寡妇不嫁被称为“守节”、“节妇”。



中国古代就有“外交”一词，但其意义与今之外交也完全不同。古词“外交”是指为人臣者私见诸侯。《谷梁传》隐公元年记：“寰内诸侯，非有天子(周王)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寰内，指天子畿内之大夫采邑。诸侯在畿外独立为政，对天子有朝贡义务，天子直属之臣民不许“外交”，即不得私自去见外地诸侯。《礼记第十一·郊特牲》云：“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二君也。”就是说，不管是周室亲臣还是诸侯下属，都不能在奉命往聘“外国”时，以私人的名义进见外君，否则，就是有了二心。小说《红楼梦》中贾府被抄，罪名之一就是身为京官的贾赦外交地方州官。可见，古语“外交”一词与今之外交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史记·邓通传》说，邓通“不好外交”，指他不好交际，深居简出。

古语“外交”虽没有外交的主要含义，但不等于古代没有外交活动。中国最早的外交活动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国家政权的出现，外交就成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交也就同历史一样向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

中国学者骆宾基经过长期潜心研究金文，证明了中国上古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炎黄五帝时期<sup>①</sup>。这样，夏朝以前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再只是传说中的史前时代。这一惊人的发现也为追寻中国上古外交活动提供了可信的佐证。

原始社会后期各部落之间除战争以外的高级接触，

---

<sup>①</sup>《光明日报》，1987年8月31日。

即为外交的萌芽。几个部落如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往往通过谈判结成部落联盟，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最典型的就是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联盟伐蚩尤。部落的联盟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夏朝就是在“万国”（众多部落）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奴隶主贵族统治政权。但是夏朝并不是华夏族唯一的中央政权，与夏并立的有许多方国（或残存的其他原始氏族部落）。古今中外，国家从来没有孤立地存在于世上。多国并立，不是兼并，就是共处。兼并意味战争，共处意味着要和平交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会有外交斗争和一般外交活动。可以这么说，外交同人类文明历史一样悠久。中国的外交远不止近代中外官方关系的建立，古代没有主权国家的概念，但不等于说古代就没有外交，即使到了近代，外交也不完全是主权国家的事务。半殖民地、半主权、被保护国也有它们的外交。只能说不同历史时代的外交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在欧洲，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之间也有极其活跃的外交活动并形成了古老的外交制度而影响至今。1861年以前仍处在分裂中的意大利，以及以1871年统一前的德意志，各割据政权也有十分复杂的外交斗争。现代外交一词与近代西方出现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权(Sovereignty)”等概念紧密相连，中国接受这些概念要晚（十九世纪中后期），而中国的外交原则、外交策略、外交思想及外交惯例很多是古代外交经验的遗传和沿革。因此，研究中国外交，不得不从上古时代的外交开始。

既然很早就有了外交，而古汉语“外交”又不表示外交，那么，古时用什么字词来表示外交呢？古汉语词汇亦

很丰富，自然不会没有表示外交的词，例：

“来而不往，非礼也。”（《礼记·曲礼上》）

“交相利。”（墨子语）

“遣使交通诸侯。”（《史记》）

“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左传》）

“文德以来之。”（孔子语）

“（辛子）与秦交而舍，使者数相往来。”（《战国策》）

“次伐交。”（《孙子兵法》）

“始乃一通焉。”（范晔语）

由此可见，古代汉语表示外交的词有：来、往、结、交、通、来往、往来，等等。

战国时含有外交意义的词还有：连、横、纵等，战国百家中，有纵横家，外交家是也。

汉朝以后，东方外交总的格局是以中国各民族建立的政权为宗主的宗藩体系，所以朝贡、招谕、来朝、交远、柔远等等都有外交的含义。

古代表示外交的常用词是“邦交”，《周礼》说：大行人（主管外交的官员之一）“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sup>①</sup>今人也把外交称“外事”，而这个词已经用了数千年。中国最早的，也是最难看懂的史书——《尚书》上就有“外事”一词。其《康诰》篇载曰：“（王语）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位。”战国时，

---

<sup>①</sup>《周礼今注今译》，林尹注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2月北京第一版，第402页。后文同。

纵横家说：“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sup>①</sup>三国时孙策遗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当今读书人都很熟悉了。

中国从秦汉时代到19世纪早期，一直不失为东亚头号封建帝国的强权地位。“宗主”当久了，封建统治者就自满起来，不想平等地与外国交往。到清朝灭亡时，仍然避免使用“邦交”、“外事”、“外交”这类古词，而用“夷务”、“制夷”、“洋务”、“夷事”等含有妄自尊大意义的词表示外交。只是八国联军侵占京师之后，清朝才正式用“外务”一词，并依照万国律例建立了“外务部”。

中华民国时代，“外交”一词才得到广泛运用，直到今天。汉语中“外交”一词的最近义词是“邦交”，如：“中韩两国邦交正常化。”

本书写的是历史上的外交官的外交家。我们在写《中国外交通史》下卷时还注意收集了有关新中国外交家的事迹，不久将开始编撰《新中国外交家》。

敬望专家和读者对本书提出修正意见。

---

<sup>①</sup>《韩非子·五蠹》，此为该书作者引纵横家语。

#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论继承和借鉴我国历史上的邦交理论遗产 .....	(1)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邦交思想发展沿革的基本 线索 .....	(2)
二、先秦邦交理论举隅 .....	(6)
三、继承历史遗产和借鉴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 .....	(27)
第二章 中国历代外交官制考略 .....	(29)
一、夏、商时期外事制度 .....	(29)
二、周朝的宗藩制度和外交礼制 .....	(30)
三、春秋时代列国外事制度 .....	(34)
四、战国时期各大国的外事官职 .....	(35)
五、秦朝外交制度 .....	(36)
六、汉朝外交制度和外交机关 .....	(38)
七、魏晋南北朝外事体制 .....	(42)
八、隋朝外交机关 .....	(43)
九、唐朝宗藩制度、外贸、外交机构及边境特区的外事 职能 .....	(45)
十、辽、宋时期外事制度 .....	(48)
十一、元朝外交职官 .....	(54)
十二、明朝外交体制 .....	(57)
十三、前清外交制度 .....	(61)
十四、后清外交机关的演变 .....	(63)
十五、中华民国外交官制 .....	(74)
第三章 先秦纵横家 .....	(76)
一、纵横家始祖吕尚 .....	(76)
二、“九合诸侯”的齐国宰相管仲 .....	(80)

三、巧辩大师晏婴 .....	(83)
四、孔子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 .....	(86)
五、利口巧辞变五国的子贡 .....	(90)
六、“弭兵”运动倡导者华元、向戌 .....	(97)
七、“古之遗爱”子产 .....	(99)
八、善用比喻的申叔、宫之奇 .....	(103)
九、“一言千钧重”的王孙满、烛之武 .....	(104)
十、“权变大士”张仪 .....	(106)
十一、身佩六国相印的纵约长苏秦 .....	(110)
十二、有勇有谋的蔺相如 .....	(113)
十三、危难中挺身自荐的毛遂 .....	(115)
十四、“朝秦暮楚”的“恣臣”公孙衍、陈轸 .....	(116)
十五、善用“远交近攻”的谋略家范雎 .....	(117)
<b>第四章 汉朝至明朝外交家 .....</b>	<b>(120)</b>
一、勇开中西交通的张骞 .....	(120)
二、宁死不屈的苏武、终军 .....	(123)
三、智勇双全的东汉定远侯班超 .....	(126)
四、诸葛亮的均势外交和驳辩术 .....	(127)
五、唐朝外交家崔敦礼、王玄策 .....	(131)
六、明朝外交家赵秩、侯显、陈诚 .....	(134)
七、伟大的探险家、外交家郑和 .....	(136)
<b>第五章 后清外交家 .....</b>	<b>(141)</b>
一、后清第一位夷务大员林则徐 .....	(141)
二、近代外交的奠基人恭亲王奕訢 .....	(142)
三、功过参半的李鸿章 .....	(149)
四、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 .....	(162)
五、虎口夺食的曾纪泽 .....	(165)
六、不可多得的使才薛福成 .....	(168)
七、至死不屈服沙俄淫威的杨儒 .....	(171)
八、状员公使洪钧和他的随妾彩云 .....	(173)

九、含冤屈死的许景澄 .....	(177)
十、诗人外交家黄遵宪 .....	(182)
<b>第六章 中华民国外交名人 .....</b>	<b>(190)</b>
一、唐绍仪 .....	(190)
二、汪大燮 .....	(196)
三、陆征祥 .....	(201)
四、孙宝琦 .....	(208)
五、颜惠庆 .....	(210)
六、伍廷芳 .....	(223)
七、王宠惠 .....	(227)
八、郭泰祺 .....	(237)
九、王正廷 .....	(241)
十、顾维钧 .....	(250)
<b>附录一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b>	<b>(262)</b>
<b>附录二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b>	<b>(277)</b>

# 第一章 论继承和借鉴我国历史上的邦交理论遗产

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并非新的课题。西人研究国际政治,或称国际政治关系,并未忽略东方古代邦交理论以及远东悠久的历史先后出现的两次宗藩国家体系。行为主义理论学派的“系统模型”专家霍尔斯蒂撰写他的《国际政治——分析结构》就是从中国周朝时的“国际关系”模型启笔的。据说亨利·基辛格不但借鉴了奥国梅特涅、德国俾斯麦等人的外交权术,还从中国战国纵横家名著《鬼谷子》一书受到某些启示。许多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论和传统的邦交思想都有系统的研究和论述,而当今中国史学、国际政治学、外交学对这一领域尚未深入进行研究。外国人对中国古人的研究是对中国理论界的挑战,中国青年学人对此不能等闲视之。

借鉴和研究中国传统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不只是一个文化上继承的纯学术问题,它对当今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历代政治家和外交家处理邦交事务的成败之因果,能使后人少遇弯路和挫折。所以,研究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既要借鉴外国的理论成果,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仅仅从当前外交构想和实践中总结出一些“摸石过河”的哲学来。再说,研究当代有诸多困难,我们只能先退几步,从过去入手,借古观今。



##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邦交思想 发展沿革的基本线索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战争与邦交问题。古代有没有“国际关系”?答案是肯定的。古人说:“国于大地,必有与立。”意义有二:一是国家的建立不是孤立的,必然有别的国家同它一样建立起来;二指国家的存在必然是与别的国家共存于世。古代国家不同于今天的主权民族国家概念,但不能以此否定古代有国际关系。不同时期关于国家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因而国际关系也各有特色。《史记》等书说黄帝能号令数百个诸侯国国主,显然那时的“国”就是氏族部落。夏、商两代与之并存的四外民族政权称“方国”,周朝时中原地区华夏族地区不叫国,而叫“天下”,周王即为“天下共主”,而那时的“国”多指是诸侯政权。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因此那时的诸侯符合近代国家三要素说。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由伟大的满族最终实现的,在此以前尽管有汉唐元三朝盛世,但也没有形成固定的版图和疆界。这种“国无常土,君无常民”的现象延续了几千年。且不说各民族之间时盟时战,就是在同一个民族内部也常常处于“分合无常”的割据分裂状态。例如华夏族在统一前就是“万国林立”的多极格局,汉朝以后有三国鼎立,唐朝灭亡后有五代十国。

古代东方的国际关系远不止中国域内同时并存的多个政权之间的关系。从汉朝开始,中国成为大东亚“汉文化圈”形式上的宗主,四邻小国与中国长期维持朝贡与封敕的关系。这种相对稳定和平的格局持续发展了二千多年,到西方向远东殖民人侵时才逐渐被打破。1895年日本从清朝手中夺取朝鲜的宗主权和列宁在1921年支持蒙古的“独立”,才使这种松散“宗藩”体系彻底崩溃。从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都加入了近代国际关系的殖民体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系。

既然中国很早就有了并存的多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中国一直处在不同的国际关系中，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是如何看待国家间利益斗争的？这里先试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邦交思想作简要的概述：

1. 先秦时代。从金文甲骨文化到秦朝统一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学术民主时代。当时虽然有奴隶等级制度和严格的封建礼规，但人的思想和学术著作却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学者仕人对任何事物可以独立阐述自己的观点。统一前的华夏族有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斗争，也有华夏族与少数民族的所谓“华夷之争”，长久的战争使人民不得休养生息，生产力遭到了无情的破坏。先哲们不得不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进行思考。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墨、道、儒、兵、法、纵横家等）在国家间关系的问题上各创一说，不能相一。总的来看，有两大思想主流，一是主张“和为贵”，恢复礼制，遵守为人为国的道德准则。其代表人物有墨子、老子、孔子以及他们的门徒。另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列国政治家和战略家，主张“农战”，用战争统一天下。他们认为人“生性好利”，国家亦然。各国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地扩充实力。荀子、韩非子的“人本恶”思想是这一派的主要理论根据。孙子说国家“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点出了国际斗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利”字。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之争自古而生，不足为怪。甚至把炎黄结盟而伐蚩尤，灭蚩尤而交恶于阪泉作为“国无常友、亦无常敌”的最早例证。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还有管子、商子、吴子等。他们的观点多为诸侯国君所接受，因而这一派理论家为政率军者颇多。这一时期的纵横游说家尤如过江之鲫，他们的外交策略和艺术毫不比今人逊色。《鬼谷子》一书的捭阖十三术是中国古代外交理论的系统总结。此外，中原诸侯称伯（同霸）者的“制夷”主张和“攘外”策略对后世影响颇大。

2. 秦汉至满清中国封建历代帝王作为远东列国“宗主”的邦交思想。历代中国王朝的统治者都视自己为天下共主，希望“远近

宾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的帝王主张“兵战以使臣服”,更多的则是想“修文德以来之”,有的视海外为“四夷八荒”,有的认为“四海之内如兄弟”。中国同四邻小国不时发生战争和冲突,其中有中国统治者对外侵略(隋炀帝、元世祖等就发动过这样的战争),也有邻国对中国犯边侵扰。但大部分时间内中国能与各邻国友好共存,“共享太平之福”。中国各朝帝王对外政策各有不同,同一个帝王在位的不同时期对外政策也不断变化。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要维护政治上“宗主”的虚荣。为了求得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景象,好战的(为数不多)帝王以重兵逼贡,多数帝王则用“羁縻”、“柔远”、“宣德化于远夷”的措施求得远近“归心”。为了这种虚荣的存在,中国封建帝王还无一不存“厚往薄来”的邦交思想。厚往薄来就是用中华之金银物产大量“赐”给外国,以换来多少一点“贡”。四邻国家因此受益非浅:一则名义上与中国结成“君臣之国”,实际上保证了国家的安全与独立;二则小小朝贡一点“方物”(即土产),可以换来大中华帝国的巨额回赐,这是一本万利的国际生意。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出现了多次“使者相望于道”、“泛海通使者不绝”、“万国来朝”的壮观场面,与中国统治者政治上“宣德于外”和经济上“厚外薄来”的思想理论是分不开的。

封建专制下,外交决策一人说了算,由最高统治者一人拍板。历代帝王学识高低和素质优劣对国家对外关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3. 清末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的邦交思想。西方列强将美洲、非洲、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瓜分完毕,就把侵略矛头指向了远东。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宗主”瘾到此过足。藩属国一一失陷,随之而来是自身任人宰割。幸而列强占据广袤的殖民地后难以尽全力向中国殖民,又幸而列强之间的矛盾很深,在联合瓜分中国的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中国才没有遭受突厥人、埃及人和印度人那样的厄运。尽管如此,后清七十年中国还是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凌辱和侵逼。近代政界和思想界面对这“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提出了一系列自强以求平等,安内以制强夷的主张。后清七十年

邦交理论多有实用色彩，主要是针对中国落后挨打的不利局面而产生的应急策略。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洪仁玕、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无不想使中国富强起来，与各国平起平坐，早日摆脱屈辱困境。这些思想家有一共同主张就是“以夷制夷”：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借夷力以制夷”。他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中国封建痼疾已非针剂可医之症。客观上看，这些人或超然物外，或回天乏力，或用策不当，或言行不一。他们的功过成败只好让千秋百口任意评说，而对他们的邦交思想和经验教训应当作深入系统地研究。

4. 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结盟主张。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民主革命党（先称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在推翻满清统治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的侵略，提出了一套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邦交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了本世纪早期的民族独立运动。领导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是土耳其人凯末尔、中国的孙中山、印度的甘地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三民主义中的一部分），就是提倡民族平等，进行“种姓革命”。他在解释民权主义时说：“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十二亿五千万人，一种是二亿五千万人。这十二亿五千万人，是受那二亿五千万人的压迫，那些压迫人的人，不是顺天行道；我们去抵抗强权，才是顺天行道。”孙中山还提出了“扶持弱小民族，消灭帝国主义”的理想。这说明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不但立志推翻封建专制恢复民族独立，而且希望世界建立起一个平等公正的政治秩序。从国民党1924年改组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中国仍旧是一个弱国，列强对中国的野心比在满清时代更盛。孙中山形容为“强邻环列，虎视鹰瞵”，“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于是他也部分继承了后清以夷制夷的邦交策略，提出了“联俄”政策，其结果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引进了伟大的马列主义和千百个布尔什维克。然而正如《孙中山——越飞宣言》上说的：“双方认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分手也必然会产生。1927年蒋介石反苏“清

党”，为时已晚，共产主义非常适合均贫富思想盛行的农民大国之国情，再则苏联红军已经进驻中国的外蒙和新疆部分地区，而且控制着东北主要铁路，国民党不是想抗就能抗的了。于是蒋介石一边倒向美英，欲借这股强力以同苏联抗衡。日本大举侵华时又“和俄制倭”，最终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

国民党借助外人，不论是“联俄”还是“联美”，从国际方面看是为了以敌克敌缓解外来压力，从国内斗争来看是为了同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势力进行斗争。实际上，中国近现代没有哪一股势力不是靠某外国的钱枪、顾问，提供培训基地和提供发动民众的教义而登上政治舞台的。例如，中国北伐战争结束以前，北方军阀各派后面都有一股或几股外国政治势力支撑着。中国近现代史的国内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政治势力在中国的角逐。

清朝末年，中国有一批留洋学生专攻西方国际法、外交学理论，志在以国际法为武器，以外交手段和艺术来争回国权，实行民族独立。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华民国政界要人或职业外交官，如唐绍仪、伍廷芳、王宠惠、顾维钧、施肇基、陆征祥、颜惠庆、王正廷等。这些纯学者型的外交官们深谙国际公法、精通数国语言，活跃在近现代国际舞台上，给贫困落后的中国带来了外交新气象，实现了超过中国国力所能达到的目标。他们学贯中西，才华横溢，对国际法和外交理论的巨大贡献得到了国际承认。在国联、联合国、国际法院的组织机构中，他们以良好的理论修养和外交风度赢得选票，为中国和全人类留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宝贵遗产。

综上所述，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邦交思想和理论。系统地挖掘整理几千年的珍贵遗产是非常必要的。

## 二、先秦邦交理论举隅

### 1. 《周易》中的邦交思想

《周易》是形成于周朝末年的一部分筮书，被称为中国文化的

“源头活水”。该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哲学和文学著作，在战国时代就被视为经典。二千多年来，《易经》一直被列为群经之首。

《周易》又是第一部反映古代外交思想的著作。全书共有 64 卦，其中比、观、兑等卦是邦交之卦。作者（不只一人）是和平主义者，主张邦国之间应和平相处，遵守各“国”会议原则，反对强权政治。主要论点是：

“外比之，无咎”（比卦）：与外国亲善联盟，对国家无害。比：亲善、联盟、结交之意。

“不宁方来，后夫凶”（比卦）：不安分的国家应学会用外交解决争端，邦国会议的迟到者不会有好结果。不宁：不安分，好斗之意；来：同比；后夫：邦国会议的迟到者；凶：受惩罚之意。这是古代国际关系的准则。

“比之自内”（比卦）：自强，内部团结是外交的后盾。春秋霸主们由此得出“攘外夷必先安内”的结论。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观卦）：观察那些国家比较清明，与之结盟、交聘，以共同拱卫天下共主。光：清明，安分；宾：结交、宾聘，商朝设宾官，主持邦交工作；王：周天子。周朝是华夏族各邦国的宗主，中国的周朝与古希腊城邦国体系不一样，因为中国各诸侯国形式上还必须拱卫一个“天下共主”——周王室。

“和兑。吉。”（兑卦）：国家之间不应以战争解决冲突，和平共处，和睦亲善才是吉利。兑：读[yue, 月]，同悦，睦邻亲善之意。

“孚兑。吉；悔亡”（兑卦）：好战，以抢掠别国为悦者，即使得逞一时，终要被人报复，后悔也来不及了。孚：俘虏，实际上是抢别国平民为奴婢；吉：得胜一时。

“来兑。凶。”（兑卦）：迫使别国臣服，会导致自身的灭亡。来：使人归附，这是一种威慑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古人认为，尽管不用武力侵略别国，但不平等待人，进行外交讹诈也会引起其他邦国的不满，故“凶”。“来兑凶”的观点与孔子“要盟也，神不听”的观点是一致的。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兑卦):协商、谈判相互感兴趣的问题;有时不一定能达成协定,但不能扩大冲突,否则关系恶化更难达成一致协议了。商:商谈;兑:共同感到和悦、兴趣的问题;介:小;介疾有喜,形象地比喻关系恶化的预兆。

《周易》的邦交观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思想。据考证:易经源于炎黄时期,历经夏之玉器时代、商之龟卜时代、周之筮卜时代,成型于孔子。这就不难理解《周易》中有儒家的和谐、中庸、安宁思想之烙印了。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礼义之邦,盖可溯源于《易经》。此三卦中的邦交思想的核心是和平共悦,侵略者、威慑者、破坏国际原则者、破坏和平谈判者都有凶兆。

战争与外交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两个主要手段,自古亦然。西周时期,周王室为宗主,大封宗室和功臣以屏藩周室,这是古代东方第一次出现的宗藩体系,延续了约 200 年。周与非华夏族“夷狄”一直战争不断,《易经》的和平主义思想是不现实的。《易经》所说的“方”(邦国),主要指华夏各诸侯。随着周室贵族日益腐化倾轧和外患不断加重,诸侯国逐渐离心离德,相互蚕食和兼并,周王地位受到威胁,宗藩体系行将崩溃,《周易》作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出和平呼吁的。

## 2. 春秋时代国际关系理论

春秋近三百年可以说是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周虽衰微,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列国并存,又不能和平共处,各大国都有统一中国的野心,但又苦于力量不足,大国间战火不断,众小国望风而动。围绕分与合,战与和等国际关系问题,春秋诸子如孔、墨、老庄、孙武等都有自己整套的理论主张。后代对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研究颇多,而他们关于国家,特别是关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国内尚无专著进行总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

(墨、老、孔三家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面对列国纷争、人民饱受战火摧残之苦的混乱局面,春秋时代出现了一些厌恶战争,幻想和平的乌托邦主义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墨子、老子和孔子。



墨子未官，无政事可为，乃一学者也。他反对侵略战争，憎恨“国与国相攻”。《墨子》说：“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难也。”他从“兼爱”原则出发，抨击对外征伐的行为。“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如何解决国与国、人与人的矛盾和冲突呢？墨子说，应“视人之国若视其（自己）国……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国与国之间也应“兼相爱，交相利。”即互相尊爱，平等互利。墨子在《非攻》篇里进一步谴责了侵略战争，他说，“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他主张以“义”统一天下，“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待也”。墨子虽然赞同用正义战争伐非正义战争，但并没有给“正义”和“非正义”下确切的定义，因此，他只是泛泛地反对侵略他国。1928年美法倡导的“非战公约”，在思想上与墨子的“非攻”是极为相似的。

墨子反对战争实际上就是反对天下统一，主张建立一种“万国林立”而又相安共处的秩序。同墨子相似的老子也主张建立“小国寡民”的世界。老子为这些“乌托邦”描绘了一幅蓝图：“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是绝对和平主义者，《老子·道经第三十一章》曰：“夫兵者，不祥之器，苟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为利益而争，他把国家利益说得虚无缥缈，鼓吹“知足者富”。老子重“道”，在他看来，只要有了“道”，就有了实力，各国应当和平共处。《老子·德经第六十一章》曰：

“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

“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除了“大者宜为下”，即大国应当视己与小国平等之地位外，老子反对干涉内政。《德经第六十章》说：“所不相伤，故德交归也。”至于国家冲突，老子认为调解还不能解决问题。“和（调解）大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这就要各国互谅互让，以德报怨。孔子外交

思想中也有“以德报怨”的内容(《论语》有载),对后世影响很大。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强调对日“以德报怨”,即是一例。

孔子同样反对干预他国内政,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被解除鲁国的职务后周游列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说与诸侯听,可惜响应者无几。孔子反对追求利益,说“小人喻于利”,《礼记》说:“国不以利为利,认义为利也。”但他不反对统一,只不过要回到礼义齐全的周天子统一的“理想国”中去。但他也知道“复礼”的主张不现实,因而主张完善现状,保持和平。孔子游于卫,“卫灵公问阵”,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反对大国称霸,他的理想是多国并存,和平共处,为此要保持势力均等,相互制约战争。孔子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以仁义安定天下,纵有“不服,则文德以来之”(“来”,即来往、外交)。孔子反对以实力逞强,主张扶持弱者,“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有害于别国,也有害于自身。在外交方面,孔子认为国际信义为根本的原则,“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以信义与外国建交)”。他还说,“信近与义,言可复也。”复,是履行、实践的意思;言,包括盟约、协议、口头达成的协定等。孔子虽坚持不可违犯信约,但反对不平等的屈辱性条约。他背约于蒲人而去卫国,弟子问“盟可负耶?”子曰:“要盟也,神不听。”要:要挟,不公正的意思。孔子的思想流行至今,故中国一直以礼、义、信作为外交准则,有“礼义之邦”的美称。孔子重视外交,赞扬以和平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论语卷三》记:“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晏子也是崇尚礼义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春秋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和平共处,反对战争,特别是反对不正义战争的孔子后代子思更系统地总结了儒家外交思想——“柔远怀德”和“厚往薄来”。《中庸》右第十九章载:“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儒家外交思想对中国外交史影响极深。

(列国执政者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理想主义的思想家多为学者，或从政时间不长或根本没有从政。与此相反，现实主义的理论家都是官位显赫的卿相将军，如齐相管仲、晏婴，吴将孙武，郑正卿子产（公孙侨），越大夫文种、范蠡，晋卿狐偃等等。这些“辅国之才”既是政治家、战略家，又是军事家和外交家，同理想主义的观点不同，他们主张发展自身的实力，追求国家的地位，一切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当时中原把四境少数民族甚至荆楚都视为外族外邦），以实力求生存，以实力求发展。春秋争霸，弱肉强食，无“仁义”可言。不发展经济，不扩军备战，只有被他国所兼并。据史书记载，齐桓公并国三十六（《荀子·仲尼》）；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吕氏春秋·贵直》）；楚庄王并国二十六，楚文王兼国三十九（《吕氏春秋·互谏》）；秦穆公灭国二十（《史记·李斯列传》）。霸国对外扩张凭的什么？管仲的理论解释为“甲兵足”。而“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田宅，经济之义。管子主张“富国强兵，通货积财”，国家地位由实力出发。“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是霸业的根本。实现“地大国富人众”就必须扩张。“君霸王，社稷定。”管仲辅助齐桓“霸诸侯，一匡天下”。史称“五霸桓公为盛”，说明管仲的实力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理想主义论者墨子、孔子也主张追求实力。墨子曾说，“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

现实主义理论家把国家利益看得至关重要，维护国家利益一靠实力，二靠扩张，三靠争取霸权。一切为了国家利益，“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孙子在《军争篇》中，通篇谈“利”，从效果上看，的确比孔、老、墨空谈“仁义”要实际得多。

现实主义还从人的本性出发，探讨国家之间关系的实质，郑国子产就批判理想主义的“仁义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道远，人道迩（近），非所及也。”

现实主义理论家几乎都在内政上有过较大的作为。管子、晏子、子产、范蠡等都是著名的改革家。对外，他们主张把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故“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同理想主义者老子“兵者，不祥之器”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

对照。

### 〔春秋时代的国际法思想〕

春秋时代，战乱不止。如前节所述，老子、孔子都反对战争，主张大小国家平等共处，墨子、管子则反对非正义战争。“以有义征无义”的思想首次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战争还必须讲人道主义。宋襄公说“君子不重(chóng)伤，不禽二毛……不鼓不列”。这是最早的战争法则，战国时代战略家尉繚子对战争法有更全面的论述。

春秋外交活动频繁，使节制度相当普遍，外交官都享有豁免权，几乎没有杀敌国使节的记载。此所谓“两国构兵，不戮行人”（行人，古官名，即使节）。

春秋称霸的霸主通常是以盟会主持者的面目出现，每次会盟，都要制定一些国家间的规章、原则，如向盟主纳贡、割地等。违犯者通常先进行调解，再付诸战争。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633年）楚率陈、蔡、郑、许联军伐宋，晋本可救宋，但先使它的秦、齐二盟国斡旋调解，未成功，三国才联合起来制裁楚国。

当然，春秋列国时的国家同当今世界民族主权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原则、规章和制度都是零星的，没有法律化、系统化。但有一点不可否认，近现代的国际法基本准则都是从古代不成文的规则和惯例总结发展而来的，有的直接为今所用，如外交官豁免，和平共处，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反对非正义战争，反对“城下之盟”（不平等条约）等等。

尽管春秋时有了国际法的非系统化准则，但正象近现代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一样，春秋强国都不同程度地破坏这些准则，仅鲁史《春秋》所载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就有483次，每次战争，发动者都有理由说明自己是“师出有名”。朝聘盟会共450次，这些“和会”又都是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的掠夺。小国对大国的朝聘，都必须按《礼仪》所载的觐礼纳贡品。贡物包括各国土产如麋鹿皮、虎貂皮、丝织品、马匹和金玉等珍异物质。《礼记·王制》说：“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小

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则君自行。然此大聘与朝，晋文霸时所制也。每次盟会，盟主主祭时执一牛耳而已。歃血盟誓，却掩盖不了大国对小国贪得无厌的掠夺。小国如不按要求贡纳，就会遭到可怕的讨伐。被征服的君民，大都沦为大国贱民，男子为奴隶，女子为婢妾，正所谓“春秋无义战”也。

### 〔关于民族关系的“华夷”论之争〕

民族矛盾、民族纠纷，源于民族利益的冲突。中外历史表明，凡诸种矛盾集中的时候，民族矛盾大于一切矛盾。古华夏族，由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而存有民族优越感。实际上，中国境内诸民族并无明显的血缘地域之分，只有文化发展的快慢之别。如，姜戎就自称是四岳之后，与中原齐、许、吕、申同姓。晋惠公也认为诸戎为“四狄之裔胄也。”不过政治上，离中原较远的边民不愿受制约，以便自由自在地繁衍发展，但他们也组织起来，对抗中原的兼并或者掠夺中原的财富和男女。商周两朝都受到“四夷”的威胁，西周末期天子竟被犬戎杀死。这对华夏民族的“优越论”是一个极大讽刺。春秋时大智大圣们都有自己的民族观。概言之，有两种思想：

第一种是民族平等思想。代表人物有孔子。《论语·子路》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来，乃建立外交关系；安，即相安共处。孔子还说：“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中原诸侯之间尔虞我诈，互相残杀，孔子十分不满，他还赞扬外族，说他们在这一点上优于华夏。“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亡：乱）。又据《左传》载：鲁定公十年，鲁齐二君会于夹谷，齐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孔子指责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子这种民族平等、和平共处的思想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子夏发扬了孔子“不可弃”的学说，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主张。这对中国历史的进步和文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另一种则是赤裸裸的大华夏主义。认为华夷不同种属，先天有优劣之分。周富辰引诗“兄弟阋于内，外御其侮”，反对同戎狄联合、通婚，诬称戎狄为“豺狼之德也”。晋士季、魏绛之流认为戎狄“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更有人认为四夷是历史上被淘汰的罪

人后代。内史过说狄蛮是“刀墨”之后，故生性不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四年》）。凡此种观点，实质上就是鼓吹民族有优劣之分，优伐劣乃天经地义。这种理论为华夏诸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依据。自古就有“神农伐斧燧，黄帝伐蚩尤，尧伐灌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利用外患召盟中原各邦，是春秋霸主一大发明。齐桓晋文等都打着“攘夷”的旗号，大都借口外来威胁以恐吓诸侯并使之归于自己盟下的一个策略而已。

古代“中国”仅指商王国及后朝宗周并守周礼的诸侯国。春秋时的中国概念仅指北方诸侯。连秦国也被“中国”诸侯看作“戎狄”，楚国也被视为“荆蛮”。但由于这些国家不自暴自弃，以实力与中原抗抵，最后迫使中原承认他们和他们所征服的四方数百个大小部族。

客观上看，华夏族以外的戎狄蛮夷也多次“侵略”中原，因此中原的征伐统一也有正义自卫的因素。春秋鲁公元年至僖公三十三年共 86 年间，戎狄攻掠华夏族 16 次，后来以晋为首的中原联合“攘夷”成功。外国史学家考证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戎狄与中原同盟缔结一协定，规定不以武力解决争端，并规定冲突双方必须将争端提交仲裁，并称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第一个“互不侵犯条约”。

中原诸侯对付“四夷”的惯用的策略是“以夷制夷”，即对境外诸族进行分化、挑拨，各个击破。后清李鸿章深得此道，曾与列强周旋一时。

### 3. 战国诸子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道家思想〕

战国时代老庄的理想主义观点和儒家的礼义治天下的理论都得到进一步完善。老子的“小国寡民”、“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思想由庄子进一步发展为原始自然主义。《庄子》一书描绘了道家的理想世界，这就是“至德之世，至治之世”，“无何有之乡”。人回到自然界，人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民如野鹿”，“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这种不现实的设想自然不会为人们所接受。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礼义思想，但孟子更希望统一，主张“定于一，王天下”。孟子认为战争是统一的必要手段，以有义伐无义，以王道统一天下。何谓王道？王道就是仁政，“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仁人无敌于天下。”他这种行仁政而使天下归心的理想主义，与战国的实际情况相距太远，因而遭到了以法家为主导力量的现实主义的猛烈批判。

国家是一群有共同利益的人的组合物，而人性究竟是善为本还是恶为本？孟子说是性本善，而荀子指出性本恶。“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求之，情之所不可免也。”人性的内容就是“情”、“欲”。欲，欲望也，“欲”使人生来好利；情，性情，“不知足，是人情也。”性、情、欲既是人的属性，那么人群中就有利益冲突。《王霸篇》说，“人情之所以同欲也。”《性恶篇》总结说，“今之人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排他性）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然则从（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国家是千人万人的组合物，则“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荀子揭示了国家利益的冲突来源于人“好利”的本性，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没有平等仁义可言，作为阶级统治的象征——国家，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关系，都有整体的利益冲突。“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物）寡则必争矣。”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更深入研究了战争的起因和国家冲突的不可避免性。

韩非子认为，国家间的冲突在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的无限性和生存空间有限性的矛盾。《五蠹》说，古时人少而财富有余，人们才能和平相处，但由于人口的激增，打破了维持和平的平衡，则为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今人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秦国商君变法后规定男在三十岁前，女在二十岁前必须结婚），由于“人民众而货财寡”，冲突是永恒的。在利益的冲突中，弱肉强食是符合历史进化规律的。要在生



存竞争时保持不败，所依靠的只有权力，“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

强调权力至上的还有很多学者。李悝的“耕战”论就是说明追求权力一靠“耕”——发展生产，二靠“战”——通过战争扩大财富。商鞅说得更明确，“国恃农战而安，主恃农战而尊”。商鞅认为，在你争我夺，天下大乱的世界里，力量就是仁义，“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有了实力就应当扩张，征伐“不开化”的落后国家，“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赤裸裸的为扩张主义制造理论。法家著作如《慎子》、《管子》等书都是强调利益和权力。这里不一一列举。

## 〔兵家论外交〕

### （一）《尉繚子》论邦交

尉繚子，魏国人。《汉书·兵家》云：“自孙、吴以下当推尉繚。”《艺文志》录《尉繚子》三十篇，今尚存二十四篇。1972年以前史学界多以此为伪书。后因在山东临沂出土该书残简，与传世本相符，伪书说被自然推倒。

（1）慎用兵。《尉繚子》通书论战谈兵，但不主张把战争作为对外政策的唯一手段，认为对外随意发动战争是国家的祸害。“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战争只能用来征伐不义之国或用来保卫国家不受侵略。而尉繚所处的时代，发动战争的人都“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周武王以道征无道，不劳市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尉繚对此大加赞赏，因为这是“义战”。尉繚对孙武吴起用兵之道作了各方面阐述，但更强调战争的局限性。尉繚子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只是诸侯强国常常恃强称霸（立威），对抗仇视（抗敌），图谋兼并（相图），各国才不能不察军务。

（2）指出结盟弊端，强调自强独立。尉繚对各国邦交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国家首先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无偿为别国作出牺牲。被侵犯的国家如力不能支，必“以重宾出聘，以爱子出质，